

引文格式: 蒋润. 集部之学的余响: 钱基博、钱钟书父子清代诗文研究述论 [J]. 常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3 (1): 106-116.

## 集部之学的余响: 钱基博、钱钟书父子清代诗文研究述论

蒋润

**摘 要:** 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秉持“集部之学”的理念治清代诗文, 此理念以别集为中心, 重心在作品本身的讲读研究, 着重辨析诗文之源流正变与各家异同得失。钱基博关注之重点在清代文章, 对桐城派尤多创见; 而钱钟书关注之重点在清代诗歌, 他的研究成绩多可见于《谈艺录》及其笔记手稿。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 钱氏父子均深受“集部之学”的影响: 钱基博虽有文学史编纂的尝试, 但未能摆脱传统文苑传及诗话文评著作的影响; 钱钟书学术视野贯通中西, 但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学批评”, 其阅读趣味和批评方式均有着浓厚的个人色彩。钱氏父子“集部之学”的研究方式, 虽有助于他们对清代诗文的关注, 却与新兴“文学史”研究范式颇多扞格, 其中呈现出的传统文学研究理念与新兴研究范式之间的互动, 是近现代学术转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关键词:** 钱基博; 钱钟书; 清代诗文; 文学史; 集部之学

**作者简介:** 蒋润,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I206.2; I206.6; I209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2.01.12

经由“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现代学者, 在研究清代文学时, 更关注白话小说而非诗文, 因此清代诗文虽然数量巨大, 但问津者寥寥。其时董理评论清代诗文者, 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可谓独树一帜, 涉猎甚广, 研究颇深。但是学者们在梳理清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时, 对钱氏父子成果的关注却不够充分。究其因由, 在于他们所代表的“集部之学”与现代“文学史”范式的扞格。本文即试图在论述钱氏父子清代诗文研究的基础上, 对传统“集部之学”与现代“文学史”范式的互动进行初步的考察。

### 一、钱基博文学研究的思想背景

钱基博生于书香世家, 自幼即熟读经史, 以精擅古文而闻名, 对文章之学有独到的见解, 其著作亦涵纳四部, 旧学功底十分深厚; 他的青年时期正处于晚清民国的递嬗时期, 新的思潮与新的文化纷纷输入, 他很早就读过《天演论》, 对生物学与自然科学兴趣浓厚, 因此, 又非抱残守缺之冬烘先生。这一旧一新两种传统交汇在钱基博身上, 构成了他文学研究的思想背景。简而言之, 钱基博文学研究的思想背景是由古典的“集部之学”与新兴的“文学史”思想交织而成的。

中国传统学术之分类根基于图书目录之分类, 在《汉书·艺文志》的“六分法”中只有“诗

赋略”，而没有集部的名称。到了魏晋时期，“六分法”渐渐变成“四分法”。《隋书·经籍志》遂以“经、史、子、集”为四部分类，集部所收多是文集辞章，钱基博论集部源流云：

吾则谓文学分而文集之名起。两汉以前，文学者，学术之总称……逮两汉以后，文与学始歧。六艺各有专师，而别为经学矣。诸子流派益多，而蔚为子部矣。史导源于《尚书》《春秋》而史部立矣。文章流别分于诸子，而集部兴矣。经史子集，既分部居；而文之一名词，渐为集所专家有。<sup>[1]</sup>

据此，所谓“集部之学”，是以“文”为核心的学问，可以理解为立足于诗文集的辞章之学。钱基博在反思自己的学术研究时，常以自己的“集部之学”为傲，他在《钱基博自传》中说：

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sup>[2]</sup>

在《读清人集别录》中，他对自己的“集部之学”有更详细的阐发：

近人侈言文学史，而于名家集，作深刻之探讨者卒鲜！余读古今人诗文集最夥，何啻数千家；而写有提要者，且不下五百家。唐以前略尽。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及清修《全唐诗》、《全唐文》，通读一过，人有论评；而于其人之刻有专集者，必取以校勘篇章，著录异同。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sup>[3]773</sup>

钱基博提倡“集部之学”，与他好读集部之书关系密切<sup>[4]①</sup>。他广泛阅读古今诗文集，且多写有提要，自陈“唐以前略尽”，可见他的“集部之学”是以诗文集为研究核心，而其研究的方式则是由“校勘篇章，著录异同”这样的文本工夫进而深入到“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的学术脉络梳理。“章氏文史之义”，即章学诚所提倡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精神。据王绍曾回忆，钱基博教授古文，往往以“辨析文章的源流正变和各家异同得失”为重点<sup>[5]②</sup>，这正是他“集部之学”的反映。

与“集部之学”不同，“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是一个舶来品。1904年前后，为了配合京师大学堂和东吴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林传甲和黄人分别撰写出《中国文学史》，算是“文学史”进入中国的先声。随着新学制的确立和民国教育部的推动，“文学史”课程“在大学、师范院校乃至中学蔚然成风，校园之外，就连一些地方上举办的短期学习班，也会开出这类题目”<sup>[6]</sup>。1913年，民国政府发布《中学校课程标准》，将“中国文学史”列为国文第四学年之课程。钱基博于是年出任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国文、历史、理科教员，1915年又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1917年转任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同年，他写下《中学校教授中国文学史之商榷》，谈到中国古代总集、别集、文苑传等体裁的缺陷，认为不利于初学者了解文学之概貌

①张舜徽在《壮议轩日记》中曾提到：“（钱子泉）先生自言居湘四载，读书三千六百册，亦云富矣。此翁治学之勤，余生平所仅见。自朝至晚，不离几案，手披口吟，每书皆有提要，信非易易。然其病在滥杂而无别择……故其所学只在集部圈子内周旋耳。”参见张舜徽著、周国林点校：《壮议轩日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6页。

②王绍曾在《钱子泉先生讲学杂记》中曾提到：“我在国专，曾经听三位先生讲授古文，讲授的方法各有特点……钱先生讲授正续《古文辞类纂》又别开生面，把重点放在辨析文章的源流正变和各家异同得失上。”参见傅宏星：《钱基博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4页。

与流变,而文学史应是“评究古今文字流别,而索其渊源之事也”<sup>[7]</sup>。他又阐述中学校开设文学史课程之初衷云:

推立法者之意,岂不曰学子于国文一科,自升学已迄中学第四学年,讽读古今名家文字略遍,于此统合平日所已诵习,为之指证流变,别白不同,自能豁然贯通,如土委地,容易致力乎?然则所为必授学子以文学史者,岂惟是辨析古今流变,使记作者姓名而已哉。固将俾之深稽古人之体势,揆其得失利病所在,以便择善从事也。<sup>[7]</sup>

在钱基博眼中,“文学史”与具体作品的讲读欣赏是一体的,立足于具体作品的讲读欣赏,再来指证流变、别白异同,方能起到“文学史”的作用。随后,钱基博陆续撰成《现代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等书<sup>①</sup>,其对“文学史”这一新兴体裁的接纳之心昭昭可见。我们可以这样归纳:钱基博的“集部之学”注重文本的分析与研究,而其“文学史”则更注重历史的梳理与归纳。

虽然钱基博一直在尝试文学史的写作,但他的文学史理念和著作与同辈时流均有不同。陆侃如批评钱基博的方法论“是从史、汉笔法中揣摩出来的文学史方法论,对于文学的研究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方法论的是非”<sup>[8]</sup>,指其以“新瓶装旧酒”,实际上于文学史的体例并未领悟。钱氏的文学史著作确实不能脱离传统文苑传及诗话文评的影响,在他“文学史”的框架里面,仍是传统的“集部之学”。他反感时人唯知探讨文学史,而对名家诗文集少有深刻探讨。正因如此,钱基博在自己的文学史著作中,便不厌其烦地摘录具体的作品,这种对作品本身的敏感与重视,正是其“集部之学”的体现。

在早期的文学史著作中,清代诗文较少为人问津。因为文学史注重的是历史的流变,以时段或作者为单位,在“一代又一代之文学”的进化观念下,时段既在最后,又鲜有显赫作者的清代诗文,便常常被忽略,即使被著录,也多较简略,仅以保证通史的完备而已。确实如钱基博所说:“近人侈言文学史,而于名家集,作深刻之探讨者卒鲜!”<sup>[3]773</sup>“集部之学”与文学史不同,它注重的是作品本身的讲读研究,以诗文集为单位,中心在诗文,而非文学史所重视的小说戏曲。以作品本身为重点,则重视风格的承继、辞体的流变,可以更细致地探讨一代一家文学的特色及流变而不受固定框架的限制。钱基博的清代诗文研究,便是在这种新旧交融的思想背景下进行的。

## 二、钱基博的清代诗文研究

钱基博对清代文学一直都很关注,其关于清代诗文的研究成果,现在可见者集中于《清代文学纲要》和《读清人集别录》。前者是文学史类型的著作,而后者则是传统的书目提要式著作。以下即围绕这两篇著作来论列钱基博的清代诗文研究。

### (一) 清代文学之鸟瞰:《清代文学纲要》

《清代文学纲要》最早出现在1933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编首》之中<sup>[9]25-30</sup>,后

<sup>①</sup>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更清楚地表述了自己对“文学史”的定义:“文学史者,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来被石声淮等以《清代文学纲要》的题名编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的附录<sup>[3]767-772</sup>。

在这篇《纲要》中，钱基博主要梳理了清代文、诗、词的发展流变。清代文章溯自归有光；进而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继起；别分为阳湖派，阳湖派承接桐城派之古文传统，而由汉魏六朝入，自张一军。当桐城派所提倡的古文渐趋衰庸时，李兆洛、阮元等人又倡偶俚之文，汪中亦以骈文见长，这便是仪征派。至晚清曾国藩以汉赋入古文，才又使桐城派古文振起，曾国藩及其弟子被钱基博称为湘乡派。

钱基博对清诗的梳理，以唐宋诗之争为线索。他于清初首先标举王士禛，以为“肇开有清一代之诗学……清诗之有王士禛，如文之有方苞也”，因为王士禛标举“神韵”，一反清初人“颇尚宋元”的风气；于清中叶则推沈德潜、袁枚、翁方纲，认为他们分别用格调、性情、肌理来矫正“神韵说”之弊病，至舒位、孙原湘复自韩愈、黄庭坚入杜甫，学宋诗的风气再次兴盛。在清诗部分，钱基博颇为得意的是对“桐城之诗”的考察。他认为，晚清宋诗运动实际上受到了桐城派的影响。他指出，姚鼐作诗，提倡由韩学杜，“已开晚清同光体之先河”。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后附《四版增订识语》中，钱基博云：“诗之同光体，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则是桐城之文，在清末虽久王而厌，而桐城之诗，在民初颇极盛难继也。”<sup>[9]440</sup>钱基博将此视为自来未经人道，而由他特拈出的创见之一。对“桐城之诗”的发现被钱钟书所继承，在《谈艺录》中有更深入的剖析。当代学者盛称钱钟书对“桐城诗派”的研究超前、独到<sup>①</sup>，其实已由钱基博发其先声。

清词号称复兴，钱基博梳理清词发展，以浙西、常州两派之消长为脉络。他评价厉鹗云：“词家之有厉鹗，如诗之有王士禛”<sup>[3]771</sup>；论常州词派云：“词之有常州，以救浙派俳巧之弊，犹之文之有湘乡”<sup>[3]771-772</sup>。在词派之外，他特标举出纳兰性德、项鸿祚、蒋春霖三人为本色当行之词人。他称纳兰性德“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sup>[3]772</sup>；云项鸿祚“浙中填词为姜、张所缚，百年来屈指惟项鸿祚有真气耳”<sup>[3]772</sup>；对蒋春霖，他则引谭献之说以“倚声家杜老”<sup>[3]772</sup>称之。

钱基博精擅古文，在论述清代文学时，以论文章流变最为亲切，论诗亦有创见，尤其是对“桐城之诗”的发掘。论词则非钱基博所长，他的评论多袭取谭献《篋中词》评语，而非深造自得<sup>[10]</sup>。《清代文学纲要》本来只是一篇“文学史”大纲类型的作品，篇幅又不长，所以但求勾勒出一代文学之发展与流变，并未有细致的分析，不过从其中论诗文的一些创见来看，还是可以看出钱基博对清代诗文的熟稔。

## （二）桐城派之研究：《读清人集别录》

在清代诗文的版图中，桐城派声光赫赫，钱基博长于古文，因此对桐城派文章寝馈至深。1925年，钱基博在《弘毅月刊》发表《〈古文辞类纂〉解题及读法》中列“《古文辞类纂》之前因后果”一节，对桐城派的渊源流变进行了梳理。他极不满时人对桐城文章的蔑视，高倡：“桐城派之起，所以救古典文学之极敝也！”<sup>[11]</sup>钱基博认为桐城派承明归有光余绪，崇尚雅洁，由韩、柳、欧、苏以溯秦汉，改变了明代以来有意雕琢诘屈的习气。这是从文学史的视野为桐城派所做的定位。而钱基博对桐城派文章的细致研究，则有赖于“集部之学”的手段，即钱氏之《读清人集别录》。

①蒋寅云：“近代以来，论桐城派一向只谈其古文，很少涉及诗学，钱钟书的这一番发掘，使‘桐城亦有诗派’成为桐城派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经历半个多世纪，我们重新审视桐城派的诗学，仍不能不佩服钱钟书见识之超前、之独到。”参见蒋寅：《钱钟书清代诗学评论刍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2卷第2期，第101—110页。

1936年,钱基博任教于光华大学期间,开始陆续在《光华大学半月刊》上发表《读清人集别录》。其前有序,阐述自己的“集部之学”,已见前所引文。在序的末尾,他道及撰作此别录的因由云:

近代姚鼐、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咸能文章,而罕知流别;又乏深沉之思;即如桐城为一代文宗;而桐城三家于古人文得失离合之故,及三家之何以自为不同;即四人集中,亦未能辨白言之。又如吾常州人好张阳湖,而阳湖恽、张之何以不同于桐城三家,究亦莫明所以也!同学有以为问,遂刺取所记,写付校刊,以昭流别而备考论云。<sup>[3]773</sup>

从中可以看出钱基博对桐城派流变的关注。在《读清人集别录》中,他著录了清人诗文集二十一种(见表1),皆采用传统书目提要的方式,在每一别集下叙述其版本源流、作者生平以及文学特点,末尾又详细采录他认为值得诵读的篇目。他的研究理念有二:一是“近人侈言文学史,而于名家集,作深刻之探讨者卒鲜!”<sup>[3]773</sup>;二是“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sup>[3]773</sup>。其基础在于对名家集的深刻探讨,其旨归在于辨明各家的渊源流别,在书目提要中又隐含有文学史的特点。

表1 《读清人集别录》著录清人文集

序号	别集名	作者	序号	别集名	作者
1	《望溪先生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集外文补遗》二卷	方苞	12	《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四卷、《二集》四卷、《言事》二卷、《文稿补编》一卷	恽敬
2	《集虚斋学古文》十二卷	方燊如	13	《茗柯文初编》一卷、《二编》二卷、《三编》一卷、《四编》一卷、《补编》二卷、《外编》二卷	张惠言
3	《刘海峰集》十九卷、附时文三册	刘大櫟	14	《养一斋文集》十九卷、《补遗》一卷	李兆洛
4	《惜抱轩文集》十六卷、《文后集》十卷、《诗集》十卷、《诗后集》一卷、《诗外集》一卷、《尺牋》八卷	姚鼐	15	《龙壁山房文集》五卷	王拯
5	《中复堂全集》九十八卷	姚莹	16	《经德堂文内集》四卷、《外集》二卷、《别集》二卷、《经籍举要》一卷、《汉南春柳词》一卷、附《梅神吟馆诗草》一卷	龙启瑞
6	《柏枧山房文集》十六卷、《续集》一卷、《骈体文》二卷、《诗集》十卷、《续集》二卷	梅曾亮	17	《怡志堂文初编》六卷、《诗初编》六卷	朱琦
7	《因寄轩文初集》十卷、《二集》六卷、《补遗》一卷	管同	18	《邵位西遗文》一册	邵懿辰
8	《刘孟涂诗前集》十卷、《后集》二十一卷、《文集》十卷、《骈体文》二卷	刘开	19	《寓庸室遗稿》一册	余坤
9	《仪卫轩诗集》五卷、《文集》十二卷、《文外集》一卷	方东树	20	《样湖文集》十二卷	吴敏树
10	《梅崖居士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	朱仕琇	21	《移芝室诗古文合编》(内《诗》四卷、《古文》附《家传》一卷)	杨彝珍
11	《太乙舟文集》八卷	陈用光			

《读清人集别录》中所著录之作者多属桐城派,因此可视作对清代桐城派文学的专题考察。书目提要的体裁使钱氏有足够的篇幅进行评论,因此较之《清代文学纲要》和《〈古文辞类纂〉解题及读法》,论述更为细致。其中评论之语,有辨析异同者,如论刘大櫟与方苞之区别云:

大抵方苞取义理于程朱,取体段于史公。而大櫟取谈诡于《庄子》,取音节于韩愈。大櫟之气矜肆,而方苞之文醇茂。然大櫟虽好为谈诡,而学庄学韩,模拟之迹太似;转不如方苞之放笔灏落,脱尽畦径!<sup>[3]797</sup>

短短数语，将方苞、刘大櫆之师承取法与各自特色皆说得明白透彻，可见钱基博的功力。再如他辨析以恽敬为代表的阳湖派文风与姚鼐、曾国藩等人之不同云：

阳湖古文以恽敬、张惠言为开山，而出于桐城……姚鼐如敛而促，意余于词而不欲尽，敬则特悍以矜，气溢于篇，而不敢尽。曾国藩用扬、马（司马相如、扬雄）<sup>①</sup>以救桐城之希淡，而瑰丽间出；其弊也杂！敬则学马、班（司马迁、班固）以药桐城之芜近，而迻变时臻；其弊也矜！其辞净而无滓，斯敬之所以同于桐城，而与曾国藩为异。其气厉而为雄，斯敬之所以异于桐城，而与曾国藩为同。<sup>[3]873</sup>

他不仅对比不同作者的文章异同，对同一作者的不同文体创作亦多有讨论，如论姚鼐文章与诗歌的区别云：

大抵姚氏之文，由归学欧；而诗则由韩学杜。姚氏之文，纤徐为妍；而诗则卓犖为桀。姚氏之文，长于掉虚，短于用实，气有余韵，文无遁力；而诗则体骨坚苍，衔华佩实，力破余地；此其较也。要其归皆出宋贤江西；特文为庐陵之不尽，而诗不憚为西江之尽耳！<sup>[3]803</sup>

钱基博认为姚鼐文章由归有光入而学欧阳修，诗则由韩愈入而学杜甫，文章骨力不如诗歌，但有纤徐之妙。“辨析文章的源流正变和各家异同得失”本就是他诗文研究的专长，这在《读清人集别录》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这些辨析都是细致的文本批评，从中可以明显看到中国传统诗话及评点的色彩。读者在这些扼要的辨析中，既能对各家优劣了然于心，也能触类旁通，领会到不同风格之流变。

《读清人集别录》就是以书目提要的体裁，融汇辨析流别之批评，这种以诗文集为单位对诸名家集进行深刻探讨的文学评论方式，正是钱基博所提倡的“集部之学”。可惜《读清人集别录》仅收寥寥二十余种别集，所讨论亦仅局限于桐城派，尚未能见出钱基博对清代诗文更宏阔的见解。

总体而言，钱基博清代诗文研究呈现出这样一种特色，即研究方式上的古典风格与研究理念上的现代趋向相结合。之所以说他在研究方式上是古典风格，是因为他始终以目录学上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研究旨趣，始终立足于精细的文本阅读以辨析流别，同时在研究方式、对象的选择上皆有浓厚的个人趣味。但是钱基博在研究中有对清代文学史的建构与探索，可见他的学术探索亦有从“集部之学”向“文学史”转型的一面，这不得不说是他在研究理念上的现代趋向。

### 三、钱钟书的清代诗文研究

钱基博在《读清人集别录》的序言中说：“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钱钟书对清代诗文确实非常熟悉，《槐聚诗存》序中他自述云：

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sup>[12]</sup>

钱钟书在初学诗歌时，便已经开始泛览清代名家诗集，后来他又与陈衍往来，对近代诗家多有涉猎。与钱基博侧重文章不同，钱钟书的学术兴趣始终集中在诗歌上，他对清代诗文的研究，也更集中于清诗而非清文。

钱基博学问的根柢是传统的目录校雠与集部之学，虽然也撰写文学史著作，体现出向现代学

① 此处应为扬雄、司马相如。

术体系靠拢的趋势,但依然是“新瓶装旧酒”,底子还是一种古典的学问。钱钟书早年随伯父及父亲读书,打下了坚实的旧学基础,后来又留学海外,接受了系统的西学教育,其学术理念中西交融、新旧杂糅的特点体现得比其父更为鲜明。当然,钱基博自豪地宣称:“儿子钟书能承余学”,表明父子二人的学问仍然有一脉相承之处,那就是“集部之学”。钱钟书一生的学术兴趣皆在辞章之学与文学批评上,这与早年所接受的“集部之学”的培养有很大关系。钱钟书并未著有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他对文学和文学史的看法,多见于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区别云:

尝有拘墟之见,以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体制悬殊。一作者也,文学史载记其承遭(Genetic)之显迹,以著位置之重轻(Historical importance);文学批评阐扬其创辟之特长,以著艺术之优劣(Esthetic worth)。一主事实而一重鉴赏也。相辅而行,各有本位。重轻优劣之间,不相比例。<sup>[13]</sup>

钱钟书的兴趣确实更近于“阐扬其创辟之特长,以著艺术之优劣”的文学批评,而这种文学批评最好的代表,要推他作于1939年的《谈艺录》一书。《谈艺录》以传统诗话之体裁,而包含了许多中西比较的命题,被誉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和传统诗话的终结”<sup>[14]</sup>。其中所论多集中于宋诗和清诗,可见钱钟书的趣尚所在。

《谈艺录》专门论及的清代作者有王士禛、朱彝尊、赵翼、袁枚、蒋士铨、桐城诗派、钱载、龚自珍等,除龚自珍较晚外,余并集中于乾嘉时期及以前。其论述的大脉络,是清代诗学宗唐与宗宋的不同趋向;在这个脉络之下,又有对各家诗学得失的细致分析;对清代诗学的一些重要命题,如“神韵”之涵义,钱钟书亦分辟专节讨论。

蒋寅《钱钟书清代诗学评论刍议》一文对《谈艺录》中的清代诗文评论多有分析,认为钱钟书的清代诗学批评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勾勒宋诗风的源流”,而其分析则“以修辞为旨归,所长在于能以丰富的诗例发抉前人诗心之同异”<sup>[15]</sup>。《钱钟书清代诗学评论刍议》中举出很多钱钟书论清诗而精当的例子,如论蒋士铨诗风的转变、论钱载诗与清代学人之诗的特点、论桐城诗派与清代宋诗风等等。钱钟书的评论既富个人趣味,又有超越个人趣味的敏锐洞察力,展现出他对清代诗史的深刻理解。

在《钱钟书清代诗学评论刍议》一文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谈艺录》关于清代诗文的研究还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注重具体诗人师法与影响的分析,由此将个体的诗人嵌入诗史流变之中。比如第三〇则论朱彝尊的诗歌学习明代“前后七子”,进而论及清初诗人多学“七子”之现象。钱钟书认为朱彝尊学问弘博,取径不仅限于唐,因此又开后来学人之诗的先河<sup>[16]272-273</sup>。对照第四二则论姚鼐推重“明七子”诗,以及后文论清代学人之诗处,可以看出以“明七子”为代表的宗唐诗风和清代宗宋之风在有清一代的互相交融与影响。

二是论诗史现象立足文本,不为成说所囿。比如第四〇则论袁枚、赵翼、蒋士铨的交谊,钱钟书认为,根据诗风来判断的话,袁枚、赵翼不应当与蒋士铨齐名,而应该是与张问陶并称。他又举出很多作品为例,证明袁、蒋、赵三家之说,其实仅是袁枚一人之说,赵翼附和,而蒋士铨则从未有此提法,进而论及三家诗学之异趣,阐明乾嘉诗坛上袁、蒋、赵三大家各自的面貌<sup>[16]351-354</sup>。这对理解当时诗坛状况和各家诗学旨趣,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

三是对具体诗人的分析细致入微,展现出极佳的文学领悟力和文字表达力。这是钱钟书最擅长处。《谈艺录》中论李贺诗部分之精妙,常令人叹为观止。在清诗部分,钱钟书论赵翼诗:“锋

芒太露，机调过快，如新狼毫写女儿肤，脂车轮走冻石坂”<sup>[16]341</sup>；论龚自珍诗用“怒”字精彩百倍<sup>[16]344</sup>；论钱载诗句法音律多变，“有志拓诗界”，“惜仅在词句上用工夫，兴象意境，未能力破余地，亦才之所限也”<sup>[16]491</sup>。凡此均能剖析入微，新人耳目，显示出钱钟书深厚的文本细读能力。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能以通贯的视野做个体研究，论清诗而眼中时时有前代诗学问题在，其体裁虽然是传统的诗话体式，但是却有文学史研究与中西比较的意味蕴含其中。如果说钱基博的研究风格是“新瓶装旧酒”的话，那钱钟书就是“旧瓶装新酒”了。

《谈艺录》虽论及清代诗学中很多重要的现象，但因为精练的要求与篇幅的限制，钱钟书对很多清人诗文的阅读心得并未体现其中，若要更全面地考察他对清人诗文的阅读与评鹭，还当求之于他尚未整理的笔记。他的笔记与钱基博的《读清人集别录》更为相似，更接近于他阅读的原貌。

钱钟书在求学牛津期间开始做读书笔记。《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收录了大量钱钟书阅读清人著述后所写的笔记，其笔记体例类似于书目提要。钱钟书每阅一书后即写下自己的评论，并摘录相关诗文。若将其评论之语析出，便是非常丰富的清诗批评材料。谨从《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二册中摘录数则，以见其概。

论钱澄之云：

阅《田间诗集》二十八卷毕。任塾序谓饮光生平诗不下万首，有《过江集》《生还集》皆入《藏山阁集》中云云。此仅辛卯以后所作，曰《江上集》《客隐集》，据文集卷十五自序，则删去甚多，已非真面矣。他日当求《藏山阁集》读之。观文集中论杜说诗诸作，足征饮光虽尊杜，而异于七子之捃摭词句，模拟声调，尤致意于近体，故集中七律最多，五律次之，五七古偶见，绝句极渺。七律为佳，次五古，复次五律，复次七古，气苍骨健，词达意真，不掉虚，不涂泽，五古似陶公，近体高者似杜，朴淡之作似香山放翁，阔率之作（适成饮光之诗）。亭林、渔洋、梅村、竹垞以至翁山、悔翁、茶村辈，皆不及其能见本色，具实力。而世人无道及者，仅归愚别裁稍能真赏，盖篇什太多，《客隐集》更芜杂颓唐牵率酬应，且入都作贵人清客，骨亦渐卑，只见其序姚经三诗所谓“诗以取适”，不见其评牧斋及诗说所谓“苦吟”矣。他日当精选数十首，庶几精彩全出，不致声名寂寞尔……<sup>[17]68</sup>

论傅山云：

阅《霜红龕全集》毕。……青主之诗，中竟陵之病而变症加厉者也。以幽深孤峭为宗旨，而以鹵莽灭裂为手段，遂至险涩怪谬、警牙刺眼。（余尝见戴枫仲《晋四家诗序》云：“支离神胜而不得其解，先生非诗人也。”可见当时已苦其晦闷矣。）调参以佛经、偈语及寒山、拾得诗，连犴板哑，字奇而无理，韵僻而失拈。盖钟、谭胆小腹枵，青主治小学，广览子书、内典，益无忌惮。五古、五律、七绝偶有幽光逸趣奇思，文拖沓拈弄，不免俚俗，议论时有可采。<sup>[17]91</sup>

论屠倬云：

《是程堂集》十四卷《二集》四卷毕。孟昭与郭频迦、查梅史交好齐名，诗格亦出入二子间，而尤近频迦，梅史较致贴雕绘。频迦松爽清峭，每以白描胜，盖得力杨诚斋者（参观《且住楼日乘》四月十二日）。孟昭于诚斋有同嗜，七言近体遂与频迦同调，而逊其轻灵妥帖。古诗视频迦为雄厚，颇学东坡，而新意不如。乾嘉时解学诚斋者又得一人，可补《谈艺录》。<sup>[17]79</sup>

论翁方纲云：

阅《复初斋集外诗》二十四卷《集外文》四卷毕。余向读《复初斋诗文集》，极薄其为笨伯学究，今复寻绎。欲为幽光密理，而乏真情意、真气骨，全仗工夫撑持，故其议论纠缠而不透，描摹细切而不生动，笔致铺叠，了无振警，于堆垛化为烟云之旨，概乎未闻。五七古、七绝写风景之作较可讽耳。覃谿自渔洋入手，终身不背，熟处难忘，后来复参东坡、道园，至若少陵、昌黎、山谷，虽诵说不已，初无入处。又专以格律法脉求古人之诗，亦才分拘苛，不能心印神会，一笑目成也。东坡大才，渔洋乏真才情，却非钝根，覃谿则得力于二人之多隶事耳。<sup>[17]298</sup>

《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共二十册，其中著录清人诗文集非常丰富，不乏钱钟书原先已看过而又温习的别集，可想见其阅读之浩博。他“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sup>[17]1</sup>，钱基博所谓：“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sup>[3]773</sup>，钱氏父子日记均不存于世，以钱钟书之笔记观之，或可略窥一二。

钱钟书关于清人诗文的诸多笔记，都可视为钱钟书读此诗文集后所做的即时批评，但有些也可以视为多次阅读后的反刍，不少还能与《谈艺录》中所论互相对照，如他在读《船山诗选》后记云：

余尝谓乾嘉三家，当以船山配袁、赵，清容尚讲矩矱而笨重，不同三子之口角聪明也。《船山遗稿》余曾细读，详见起居注四。其诗五七古尚有作意，佻滑同于袁、赵，而灵活巧妙逊之，近体语奇而韵，较二家稍为蕴藉，自是合作，且时有见道之语……论诗宗旨，尤与袁氏一鼻孔出气也。<sup>[18]146</sup>

这里论张问陶与袁枚、赵翼风格之同异，可以补充《谈艺录》中论袁、蒋、赵三家处之观点。钱钟书读《忠雅堂文集》论蒋士铨与袁枚、赵翼不同以及蒋士铨诗风，亦与《谈艺录》基本相同，可相映发<sup>[18]199-204</sup>。

再如程恩泽作为晚清宋诗风潮中的重要人物，《谈艺录》中却未有专门论述。钱钟书读《程侍郎遗集》后，在笔记中记云：

……重春海为凌次仲，阮伯元弟子，博观强诵，于乾嘉朴学本为专门。有清一代以学入诗者翁苏斋，而化学为诗，自然流露奥衍沉博之观，而不屑屑如苏斋之以韵语为考订者，要以春海为第一人。凌仲子乃苏斋弟子，春海于苏斋盖为再传，学人之诗，渊原固有自来。梅伯言乃桐城诗派，出入山谷、后山间，春海与之游，同光宋体线索亦尚可求也。其赋与骈文皆雅而不丽，古而实涩，好用奇字古文，亦学人之蔽。其散文亦节约错落，颇碎而促，无舒卷顿挫。祭文皆累累千言，尚动宕可诵，祭宋芷湾、吴兰雪二首，尤资谈艺之助。祭吴文有云：“杜韩难真，汉魏易假。”乃甘苦心知语，学人作诗知歧向于韩，如无家而得舍，探骊而得珠，此春海之所□<sup>①</sup>发也。<sup>[18]128</sup>

“春海”即程恩泽之字，程恩泽为同光宋体之先声，钱钟书在这则笔记中指出程恩泽与乾嘉时期学人之诗、桐城诗派两股脉络的联系：程恩泽为凌廷堪所重，而凌廷堪本就是朴学家，又是翁方纲的弟子，这是学人之诗的脉络；梅曾亮为桐城派后劲，诗学黄庭坚、陈师道，他与程恩泽交好，这是桐城诗派的脉络。两脉合二为一，便开启同光体之风格，而程恩泽则是其中关键的一环。晚清宋诗派强调由黄庭坚、韩愈入杜甫，程恩泽所学正是此路。他对杜甫、韩愈皆有工夫，

①按：末句初作“此春海之所独至也”，后涂改“独至”为“□发”，“发”上一字模糊不能辨。参见钱钟书：《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2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8页。

钱钟书摘其祭吴嵩梁文中之语，称程恩泽于杜甫、韩愈作品领会深切，正指出了此点。

钱钟书对清代诗文的深刻理解，正是在这样的步步积累之中得出的。他的笔记是“采铜于山”，待积累成熟后，再加以提炼，便成为《谈艺录》这样的名作。钱钟书在研究清代诗文时，阅读量既广博，领悟力又敏锐，在“集部之学”的修养中包含了文学史梳理的手段。当然，他的研究也有浓厚的个人趣味。他读过的诗文集，在今人看来，很多并非出自名家，在文学史上未必有其位置。不过，他的文学批评本以欣赏领会为主，因此常能发现遗落于文学史之外的幽花异草，这是在文学史框架中亦步亦趋者难以做到的。

#### 四、结语

钱基博对清代诗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章，对桐城派之流变尤有发明，钱钟书对清代诗文的阅读更博于乃父，其好尚在诗歌，亦与其父异趣。但他们细致的文本批评与较为传统的研究方式，均出于“集部之学”的陶养。清代本处于中国文学史之末端，无论是以“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进化史观还是以发掘白话文学为主的平民史观视之，清代诗文都并非重要的研究对象。二十世纪以来，深受两种史观影响，以勾勒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为目的的中国文学史，往往对清代诗文颇为忽视。但清代为中国古典诗文之结穴，唐音宋调，骈俪散行，各擅其场，欲深入了解集部诗文的流变，不得不在清代诗文上下一番功夫。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之所以能在清代诗文领域深造有得，便是受到他们所提倡的“集部之学”的影响。盖“集部之学”以诗文集为单位，以辨析异同、考订源流为职志，其目的在于辨析文艺之优劣，其中心在于诗与文章，并不受进化史观与平民史观的影响。钱氏父子对清代诗文的研究，侧重于艺术分析，而绝少论及时代背景，多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而非外部研究，皆为“集部之学”的体现。

钱基博学问方式虽传统，但在思想上却并不排斥新学，他又在中学、大学长期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面对新兴的文学史体裁，他也积极运用，力图将“集部之学”与“文学史”相结合，但“集部之学”与“文学史”之间还是有较多扞格，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史》之饱受非议，便可见其一斑。钱钟书受现代学术影响较深，其“集部之学”的手段多与文学批评的理念相结合，对清代诗文的研究较其父更为博大精深，但他并无意于建立过于严整的系统，又较少撰写文学史的实绩<sup>①</sup>。其阅读包含个人趣味，其论诗著作多为传统札记体裁，均与现代文学史的体例相去甚远，因此，他的成绩也常常被低估。钱氏父子的清代诗文研究所代表的乃是传统“集部之学”的余响，其中呈现出的传统文学研究理念与新兴研究范式之间的互动，是现代学术转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议题。

#### 参考文献：

- [1] 钱基博.“古书治要”之教材举例 [J]. 新教育, 1925 (3): 407-418.
- [2] 钱基博. 钱基博自传 [J]. 江苏研究, 1935, 1 (8): 1-4.
- [3] 钱基博. 中国文学史: 下 [M]. 曹毓英, 校订.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sup>①</sup>钱钟书并非无做文学史的能力，其友人邹文海认为钱钟书“实在是写文学史最适当的人”（邹文海：《忆钱钟书》，出自杨联芬：《钱钟书评说七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钱钟书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参与编纂社科院文学所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其《宋诗选注》之作者小传亦颇有文学史之意味。但是钱钟书自己始终未写出真正称得上文学史的著作，这与他的学术趣向不近于文学史是有关系的。

- [4] 张舜徽. 壮议轩日记 [M]. 周国林, 点校.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26.
- [5] 傅宏星. 钱基博年谱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94.
- [6] 戴燕. 文学史的权力 [M]. 增订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87.
- [7] 钱基博. 中学校教授中国文学史之商榷 [J]. 教育杂志, 1917, 9 (2): 46-59.
- [8] 陆侃如. 评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J]. 文艺先锋, 1943, 3 (2): 64-66.
- [9] 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 [M]. 郭璋, 校订.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10] 刘红红. 试论谭献的清代词史观 [J]. 常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1 (2): 99-108.
- [11] 钱基博. 国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65.
- [12] 钱钟书. 槐聚诗存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1.
- [13] 钱钟书. 中国文学小史序论 [J]. 国风, 1933 (8): 5-19.
- [14] 陆文虎. 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和传统诗话的终结: 读钱钟书《谈艺录》[M] // 杨联芬. 钱钟书评说七十年.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318.
- [15] 蒋寅. 钱钟书清代诗学评论刍议 [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62 (2): 101-110.
- [16] 钱钟书. 谈艺录 [M]. 2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17] 钱钟书. 钱钟书手稿集: 中文笔记: 第1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18] 钱钟书. 钱钟书手稿集: 中文笔记: 第2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The Afterglow of Paradigm of Jibu: On Qian Jibo and His Son Qian Zhongshu's Research of Poetry and Prose in the Qing Dynasty

Jiang Run

**Abstract:** Qian Jibo and his son Qian Zhongshu studied poetry and prose in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idea of “paradigm of Jibu”. The idea takes Bieji as the center, focuses on the appreci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exts, distinguishes the original from the derivative and point out authors' advantages and flaws. Qian Jibo paid more attention to prose in th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School of Tongcheng, about which he had more original ideas. While Qian Zhongshu laid emphasis on poetry and his achievements are presented in Tan Yi Lu as well as his notes and manuscripts. As to research concept and approach, both of them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paradigm of Jibu”. Qian Jibo had tried to compile literature history, but his work doesn't get rid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Wenyuanzhuan i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hihua in literary criticism. Qian Zhongshu had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studies, but he preferred “literature criticism” in approach. His interest in reading and style of criticism are very personal. Although the research method of “paradigm of Jibu” can help them to focus on poetry and prose in the Qing dynasty, it i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paradigm of the emerging “literature histor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research concept and the emerging research paradigm is a topic worth discussing in the modern academic transition.

**Keywords:** Qian Jibo; Qian Zhongshu; poetry and prose in Qing Dynasty; literary history; paradigm of Jibu

(收稿日期: 2021-09-24; 责任编辑: 陈鸿)